

XIANG GANG
SANWENXUAN

香港散文
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I263/85

香港散文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香 港 散 文 选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 1/4印张 197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0

书号: 10173·180 定价: 0.80元

目 录

冬天的故事·····	舒巷城 (1)
可敬的人!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代跋)·····	彦 火 (5)
遇合·····	萧 铜 (8)
故乡的榕树·····	黄河浪 (17)
故乡情·····	李 泊 (21)
茉莉花·····	黄河浪 (23)
巴更沙的家族·····	夏 果 (28)
帆影·····	海 辛 (33)
天台·····	一 叶 (42)
海和少女·····	连 云 (51)
当她以为自己快死的时候·····	夏 易 (55)
将雨·····	卓 力 (60)
别离的故事·····	涂陶然 (65)
屋三题·····	李 怡 (70)
非洲有间屋·····	曾尚平 (76)
报摊前·····	李 怡 (78)
歌鸟·春天·生活·····	黄蒙田 (80)
山村居小品·····	吴其敏 (87)

山村居随笔·····	吴其敏 (94)
猫鼠之什·····	吴令湄 (101)
这一首歌·····	涂陶然 (105)
元宵杂谈·····	石 花 (109)
花叶随笔·····	吴令湄 (112)
拾回的记忆·····	涂陶然 (116)
芭蕉园之忆·····	海 辛 (121)
台前纪感·····	吴双翼 (129)
海之歌·····	无 涯 (133)
井及其他·····	李 阳 (137)
青虫 (外一章) ·····	夏炎冰 (144)
落叶·····	李 怡 (149)
风筝——天空的浮萍·····	海 辛 (151)
载满欢笑的迎亲船·····	海 辛 (155)
谈书集 (一) 至 (四) ·····	谷 旭 (164)
我读泰戈尔·····	谷 旭 (180)
唐代的武侠小说·····	梁羽生 (188)

作家们的情谊

——《国际作家风貌》代序·····	何 达 (191)
在聂华苓的家里·····	何 达 (196)
聂华苓·风·笑·····	彦 火 (212)
美国诗人保罗·恩格尔的手·····	何 达 (217)
菲律宾之恋·····	彦 火 (222)
我的英国朋友·····	舒巷城 (253)
新年·····	陶 然 (257)

冬 天 的 故 事

舒 巷 城

……是的，那一年你问过我的归期，但那时候归期无定的我是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南方这个岛城来的。现在呢，东漂西泊之后带着异乡的尘土我到底回来了，回到我出生之地的我们这条街上来。然而，就在每天看到鲤鱼门海峡众多木船的这个海湾里，我却想起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些往事，和那一段流浪的日子。

我想起自己所走过的西南的小城，乡野，和穿云锁雾的重山；也想起战后自己留下过足迹的越南和椰树下的街道。更想起东北……嗯，那一年那里的雪很大呵。

怎么，在这亚热带的岛城，竟想起那里的雪来了？

但我第一次看见雪，却是在西南的一个小城里，而不是东北呢。

哦……那是一九四四年（抗战后期）的事了。你也听说过吧：“湘桂大撤退”是那时候有名的大悲剧。那年秋天，在“疏散”声中我离开了桂林，象无数的湘桂难民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靠一双腿从这一省走到另一省；在阴晴无定的漫长的路程中，晓行夜宿，睡“伙铺”，稻草，地面，后来和旅伴千辛万苦到了贵阳。就在那里看见雪。

你说，雪好看吗？啊，不，不——虽然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的雪。想想看，那样的冬天，衣衫缺乏——雪，有什么好看的呢？

后来吗？后来随身之所漂，又走了，因为我那时有机会坐上人家的车子到昆明去。

车行了好几天，沿途所见，高高的山，重重叠叠的山，难民之外是白茫茫的雪。车轮子要扣上铁链子才能爬得上陡斜的，雪滑的半山公路。有些车子在途中翻下来，车毁人亡了。唉，那年的冬季实在很冷很不好过啊。我们抵达那天，连气候是“四季如春”的昆明也看见一点点薄霜了，而在我们的车子上，有人的行李还结着从贵州省带去的厚雪呢。

战时的生活是艰苦的，而那时候的冬季又仿佛格外漫长。于是咬紧牙关，在漫天风雨中期待晴朗的春天。

第二年八月，抗战胜利了，悲喜交集之中，你知道吗，作客异乡的人们谁不想一下子就回到老家去！但有人缺少路费，一家大小，寸步难行，便滞留于重山之间的云贵高原上了；而有人则早已作好回家之计，离开海拔七千呎的昆明。但我呢，辗转他方，曾经一度南下却未曾南归。

后来（那是和亲人失去联络很久的“后来”），我这远方的游子，有机会接到家里的远方来信了，感到温暖，但又感到惘然。因为那时候呀，为了觅取食粮，我象一只漂泊的小鸟，西去南行之后竟又向北飞飘……

呃，对了，使我难忘的是，一九四六年的一夜，在东北的一个小镇外碰上的那场风雪。

到了冬季，你也知道，南方也是日短夜长的，但那儿的白昼比南方的更短。往往当你以为黄昏尚未到来时，白天早已结束了。

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南方的少年，在那样寒冷的异乡是怎样

渴望收到来信，又怎样“需要”写信。因为读信时，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而写信时，即使灯前独白，也不用担心没有人倾听你的忧愁。

而当时在我待下来的那个地方，若干里内才有一个设有“邮局”的小镇——可以寄信的小镇。

现在要说的是那个无事可做的下午了。珍贵的阳光在秃树之间灰色的屋顶上，仅仅出现了一会儿就隐去，然而，为了急于把前一夜写就的两封回信投邮，出门之后，便不管前面的苍穹摆出怎样阴沉的脸孔了。同时，寂寞之中，实在也想趁便到那虽说偏僻却还算热闹的小镇找点热闹去。这么着，到了那里，寄过信，逛过市集，在一户跟自己谈得来的北方人家那儿吃过饭之后，坐了一会，走出来时，纸糊的窗户透出淡淡的黄菊似的灯光，小镇和它的窄街已经静悄悄地躺在沉沉的夜色中了。

而风呢，一刮起来就刮个不停。

那一晚，越走越不是味：四下里荒凉得不见人影，因此，从镇上回住所去的那段不算短的路程似乎越伸越长，偶尔看见疏疏落落的灯光，但也不过荒凉中添点冷冷清清罢了。身上虽然穿得够臃肿的了，可那鬼天气冷得你直打哆嗦。望着那死寂的山野，公路，我有点后悔“不听老人言”了：下午出门时，那个善观天色的好心的老头儿曾经劝告过我的——

“这种天气，出去干什么！我看哪，早点儿歇歇，哪也别去吧！……待不住吗？嗯，那就得早去就回了。”

真的，谁会在有迹象下雪的如此寒夜独行，象我那样莽撞的呢？

风越刮越大了，飘来了粉屑似的阵阵的雪。心想，这回可糟了，但是，还来不及看清楚前面的一排排秃树的时候，象鹅毛又象面条般的雪纷纷落下，跟着，雪花乱转之间，呼呼的风也卷起一

团团一堆堆的雪往脸上身上扑打过来了。退回去吗，不能！只好冒着风雪趑趄趑趄地往前走去。

雪，落得更大。开头还听得见地下的窸窣声，继而什么也听不见了，除了那挟雪而来的风声。

在一片比大雾更浓的迷濛中，再也看不见灯光，如果有灯光的话。

我喘着气，停一回，走一回，觉得眼前闪过一片片的灰白。其实这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眼睛已给雪打得无法睁开来。脸僵硬了，连耳帽里的耳朵，手套里的手，也好象失去了下落。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才跌跌撞撞地拖着沉重的冻僵了的双腿回到住所里，全身麻木，一时之间仿佛连什么感觉也失去了……

你喜欢雪吗？嗯，从前在我的想象中，我也是喜欢的。

假如冬天和家人围着火炉喝一杯热酒或者咖啡，望着窗外的朵朵雪花，你也喜欢的吧？

但那是另一个故事，另一个世界了，朋友。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那一次以后，雪往往使我想起不愉快的冬天和不愉快的故事，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曾见过饥寒交迫的人们，在严寒的冬天里找不到温暖的灯光与炉火。

假如你象一只觅取食粮的小鸟那样，在寒枝与寒枝之间，在积雪与积雪之间漂泊，你也不喜欢那样的冬天吧？

……哦，对了，你问我归期的那一年，我向往的正是春天啊。嗯，阳光和温暖……毕竟是可爱的，我以前说过，现在也是这样说。

一九四九年一月，香港西湾河。

可敬的人！（代跋）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

彦 火

在那些灰黯的年代，有不少文艺家为真理、为国家民族而殉难。

在中国，远的有屈原、司马迁，近的有在战争里牺牲的文化战士，最近的有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文化浩劫中被迫害的大量文艺工作者。

有些是以死谏君的，有些是被杀害的，有些是自杀的。

有一些日子，读了不少纪念在“四人帮”时期被迫害而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的文章，心情是沉甸甸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时是很令人气丧的，但是，却也有那么一些人熬过来，而且在白色恐怖下象小偷（黄永玉语）那样进行忘我的创作。

巴金在那段被无情批判打击的日子里，爬上汽车房，埋头翻译俄罗斯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全书分五卷，计一百五十万字）；姚雪垠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争分夺秒地继续未完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艾青受排挤，在边远的新疆写着小说；丁玲举箸不灵，胸悬木板不忘创作……

他们在波涛汹涌的年代，没有逐浪而去，也没有在凶险的生

活怒涛中没顶，宛如从狂飙中钻出来的风帆，呈现出韧战后的安祥和宁静。

这些人，并不遥远，都是我们熟稔的文学家、诗人，而且都在我们的中间，都是受到广大读者拥戴，可亲可敬的人！

想到他们，我总是联想到罗曼罗兰笔下的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永远在经历磨难，在接受磨难；而且永远在黑暗的生活里追寻艺术的光与热，他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活力，他说：

“与其靠幻想而生存，毋宁为真理而死灭……可是，艺术，难道不也是一种幻想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而应当是真理！真理！睁大眼睛，从所有的空隙里吸取生命底强有力的气息，看见世界万物底真面目，正视着人间的苦难——然后放声大笑！”

这是伟大的生活态度，永远不屈服于环境，永远开拓新的生活。但，中国的文艺家，他们的经历，比之克利斯朵夫来得更迂曲，更坎坷，更慑人心魄，他们受的打击是暴烈的，不仅仅在精神上，还在肉体上，不仅仅是身心的摧残，还有政治的迫害……克利斯朵夫所经历的，他们经历过，克利斯朵夫所没有经历过的，他们都经历了。他们之中，不少人具有“死守真理，以拒庸愚”（黄秋耘语）的大勇主义精神。

如前面提到的，我们的文学家并没有在苦难的面前倒下，而是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七十五岁的巴金还在构思长篇小说；年逾花甲的艾青要求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端木蕻良在得到冠心病后，也在奋力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丁玲虽患了糖尿病、乳腺癌，仍矢志要完成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他们争分夺秒地与生命竞跑，作出壮烈的冲刺。曹禺说：“对于我们这样的老人说来，时间，是不能以每一页日历来计算，而要以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来计算的。”

正如克利斯朵夫说的：“我是永久的战斗。”我们的文学家，无愧于文艺战士的称号，他们进行永不疲惫的笔耕，为我们的文艺宝库增添更多的资产。

每次看到他们的文章，都使我全身的血液升腾起来。

怀着钦敬的心情，近年在多次的回中国大陆参观访问中，荣幸地会晤了一些当代中国作家，亲炙着这一颗颗伟大而火炽的心灵——他们还来不及医好心灵上的创伤，对新的创作、新的理想、新的生活，已灼灼地燃起炽旺的热情之火，写下不少振奋人心的新篇章，令人雀跃、欢欣。回来后，曾写了一些“作家印象记”、“作家散记”和“访问记”，发表在报章和杂志上。当时发表这些文章，意在将中国作家的一些新动态，及时向海外关心的读者作一报道，并不预备结集出版的。后来刘以鬯先生一再鼓励和怂恿，并为之荐引出版社，增添我汇集成册的信心。刘先生古道热肠，感人肺腑。

本书所收的文章，大部分都经过作家的亲自过目、勘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巴金先生，他在百忙中为我补上《巴金创作年月表》遗漏部分；萧乾先生在七九年十二月从美国爱荷华返国经港时，为我和梅子兄提供了不少有关他创作活动的详细资料，使我们得以编成《萧乾年表简编》；著名诗人艾青及其夫人高瑛女士，一开始便给予深切的关注。此外，著名作家叶圣陶、俞平伯、端木蕻良、卞之琳和黄秋耘等，都在繁忙中亲自为拙作勘正，笔者的感激自然也是言之不尽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三日于香江

遇 合

萧 铜

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说过：“人间有很多遇合，隐隐中有一根伏线，这根线可以伏上十年、二十年或三五十年。”

现在就来记下一些我的遇合。

—

头一个想到小学同学黄君。

与黄君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第二附小同学。当年都是十一岁。

那时，我与黄比较接近，他家就住在学校附近，有时放学就去他家。

黄家原是福建人，黄的父亲好象是做医生的。

因为去过黄家，就认识了黄的哥哥、姐姐。

在小学里，我很喜欢女同学管，我坐在她身后，常常找她借橡皮，借铅笔，借这借那，跟她说话。

管是个品学兼优的女孩子。她父亲是我父亲的上司，家中富有。

管不大爱讲话，很秀气，很用功。只记得她是个清秀、白净、瘦弱、文静的女孩子。

似乎，黄也喜欢管。有时，我和黄在操场上打打闹闹，同学们就说我和黄是“情敌”，打“卜克心”。

一九四〇年深秋，我家“回南”了，迁往南京。在南京遇上黄，到他家去过，他母亲还留我吃饭——当时与黄都是初中学生，不同校。

当时黄的父亲好象在南京什么医务机关做事。

一九四九年夏我到台湾，在台北火车站遇见黄的姐姐，才知道黄的全家也已迁到台北。

过了几天，我去厦门街看黄，他腿部受伤躺在床上。是踢球受伤？还是骑车跌伤？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没什么话谈。当年我二十一岁。

在台湾十二年，与黄只见过那么一次。

大约是一九五三年，我们一个小剧团去台湾南部跑码头，在冈山“空军官校”演出，见过黄的哥哥，他正在受训。

现在说说小学女同学管，对日抗战胜利以后，她的父亲因汉奸罪入狱。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前后，她父亲被枪决。

最近，从美国来的朋友说起：管早已去美国，居于纽约，已结婚。

我正在打听管的地址，我想写封信告诉她：相隔三十三年，我终于在一九七三年春重到北京去过了，旧地重游，而且到过“第二附小”——现在是手帕胡同小学。

至今，我还记得管的微笑，文秀的微笑。很喜欢她微笑。那时，她大概也是十一岁。

二

十七岁那年在南京，认识了女同学T。

T白白净净，方脸，大眼睛，常穿一件蓝布旗袍，当年大约十六岁。

当时中学生的“恋爱”——如果可以称作“恋爱”的话，也只是她来找我借本书，还书给我时，在书里夹了一张小纸条，或夹了一张她的“登记照”，在“登记照”后面，写上几个句子，象是新诗之类。

对日抗战胜利以后，我去开封做事。两年后回到南京找T，当时她在某电台做播音员。

找到T那年，我二十岁。就约T去吃饭，看电影。

除了吃饭与看电影，我什么也不会。

做播音员的，工作很刻板，按时关在播音室里，独自讲话，放放唱片。有天晚上，我坐在播音室里陪T，忽然进来一个身材高大、黑胖脸子的神父，对我恶狠狠地瞪了几眼就走了。

就是那天晚上，我与T走到新街口看电影，到了电影院门外，她忽然说：“不要看了。”

我说：“去喝咖啡。”

她说：“也不要。”

“那——”

“随便走走。”

我默然，跟她走呀走的，跟她走进黑漆漆的华侨路，走到当时南京的“情人路”，在黑朦朦的山坡石凳上，两人坐下。她没什么话说，我也没什么话说，两人就那么干坐了半天，在黑暗中，有些谈话，也是楞挤出来的，有一搭无一搭。我坐在那儿，

与T相距有半呎，象老僧入定，象呆鸟。可偶有一辆汽车经过，车灯一亮，我还有点不安，唯恐“引起误会”。

那是个静静的春夜。

我呆坐着，聊的也是电影：“什么片子你看过吗？”这些。

最后，她幽幽地说：“走吧。”

我送她回到电台。自那以后，打电话去电台，回说T不在，去找她，守门的人说T不在，不准我进去。

那几天，我苦恼极了，失眠。连连给她写信，没有回信。

还模仿美国电影，请花店给她送去一束鲜花。

白扔。

正在苦恼，偶然遇到T的一个女同事，这女同事告诉我：T实际上已跟那个神父（也就是电台台长）姘着，那家电台的钥匙，也全部由T保管。

真相大白，我不再苦恼，好象一个病人遇到了对症的良药，病，立刻就好了。

一九四九年夏到台北，有天在路上遇到T，她在台北某电台做播音员，叫我去看她。

这趟，我心里有了底，仍去电台找她，见面，也不说破。

有天晚上，从西门町坐三轮车送她回去，在一条大街的巷口，她下了车，连连说：“不用送，不用送。”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走进那条小胡同，看到一户日式平房的玄关，摆了女人的鞋，男人的鞋，还有小孩的鞋。

我猜：那就是T与神父的家。

我转身出巷子，真巧，就在巷口撞上T买菜回来，见了我，她很镇定，含笑问我：“找谁？”我说：“找个朋友。”

“哦，哦。”

我走了。

一晃多年，没见过T，听朋友说：那个神父，后来为了T的事，调职了。

又听说：T已嫁人了。

大约是一九五八年夏，我带了年方四岁的女儿，在台北中华路平交道旁小店里喝酸梅汤，忽然，见到T手上抱了一个孩子，身边跟了两个孩子，与一个男人来到小店门外喝酸梅汤。

那男人大概是T的丈夫。我看着，猛然想起：这男人，就是多年前台北某电台楼下百货店的职员。

我望着小店门外的T，才发现，她很矮，肚子又大了，就更显得矮。喝了酸梅汤，就施施然带着孩子走了。

夏天下午的西门町，阳光下，满街车辆、行人，乱哄哄。我眼望着T和她的丈夫、孩子，施施然走入人丛中，不见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去华东旅行。临离开南京那天清早，在旅馆附近散步，走了几步，突然见到“华侨路”三个字，一怔，就走进巷子里，走了十几步，才退出来。

当时才想起：“华侨路”就在旅馆的旁边。

自己也想不到，相隔二十多年，我这呆鸟，竟又走到这条巷子里来。

真有意思。

三

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在台北，一个陌生人来找我。

陌生人说他姓金，是我小时在北京太平胡同的街坊邻居。他看到我写的小说中提到太平胡同的许多人物与事物，才来找我，一谈之下，果然是老街坊。

金说的全对，全符合，连我小时在胡同里的一举一动，他全